



改革开放后，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正式代理个人股票买卖业务。

亏都是国家的，企业只管进进出出，但随着改革深入，企业取消“皇粮”，好坏都是你兜着，迫使你担起责任，重视市场，也振奋人们一度失落的想象力、创造性。倪智强不仅要关注国际市场变化，与外方联手生产定牌产品，同时越发关注金融知识，“要搞清怎么去投货物保险，不同的保价针对不同的货品，还要关心外汇波动，在银行帮助下确定浮动价格公式，减少汇率风险”。

而在内贸领域，得益于金融领域改革，上海先是自身突破部门、地区和所有制界限，大力推进工业改组和企业联合。1981年4月，上海就试办三百多户新的经济联合体。它们有跨行业、跨部门的联合，工农、城乡之间的联合，跨地区、跨省市的联合，工商、工贸之间的联合，不同所有制之间的联合等等。从联合的内容看，主流是资金、厂房设施、劳动力上的联合，实现了“1+1 > 2”。紧接着，出现了上海与外地省市的联营企业、“补偿贸易”、技术合作等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使上海同兄弟省、市、自治区之间进一步加强横向经济联系，按照协议，由上海提供资金、设备和技术，支持对方扩大产能；对方向上海提供原辅材料和零部件，货物照价结算，按规定收回投资。在那个计划物资紧缺的年代，这种合作既促进兄弟省市的生产，又部分解决了上海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供应问题。

当然，更惊动世人的莫过于股票重现上海街头。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市分行颁布了《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1984年7月，上海飞乐音响与北京天桥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唯二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单位。借助资本的力量，飞乐音响在短短八个月里狂飙突进，承包完成近三十家宾馆饭

店、体育馆、俱乐部音响设施的设计、安装、调试工程。飞乐老员工回忆，正因为股价与企业效益乃至职工自身利益密切挂钩，公司的产品研发创新频率很快，总是能走在市场前面，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股票上市前，飞乐一年只生产十二台（套）调音台和音响设备，但现在根据市场信息，一年产量达到二百台（套），还搞出双径向声柱、组合音箱、近讲话筒等新产品，赢得不错的口碑。1986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邓小平将面值50元的飞乐音响股票，作为新中国第一只股票赠给凡尔霖，对方喜出望外……对于这一幕，国际舆论惊叹“中国与股市握手了”！

1986年10月13日，国务院在对《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中明确指出：“上海是我国重要的经济、科技、贸易、金融、信息、文化中心，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之一。”随着市场经济这只“无形之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上海在经济领域更上一层楼，就必须进一步扩大开放，实施深度体制机制改革。毕竟，市场经济活动的一大准则就是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互利互补”，上海作为特大型经济中心城市，着眼于培育和发展高层次、大容量、强辐射的市场体系，需要大力促进地区之间、国内外之间商品、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的流动和组合，这中间，“资金”这一要素的流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旦上海成了国内外资本最能赚钱、商业机会最大、交易成本最小、市场竞争最公平的地方，也自然而然地“中心化”了。

始终有进球之心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到来，国家先后出台投资、财税、金融、外贸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向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阶段。

这一年12月19日，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足球队长出身的首任总经理尉文渊这样激励最早的22位员工：“要跟踢球一样总有破门的欲望！”可曾想，今年股票总市值位列全球前三的上交所，刚诞生的那一天只有30个品种证券交易，当天累计成交49笔，成交额5879008元。但谁能想到，为了这一刻，身体强健的尉文渊已经高强度工作忙了好几个月，就连开市也是硬挺着浮肿的脚挪到二楼等待开市敲锣，